

NONGMIN JIQI XIANDAIHUA

农民及其现代化

李晓翼 著

地 资 出 版 社

农民及其现代化

李晓翼 著

地质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及其现代化/李晓翼著.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116-05801-9

I. 农… II. 李… III. 农民 - 现代化 - 研究 - 中国
IV. D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0593 号

责任编辑: 何 蔓

责任校对: 郑淑艳

出版发行: 地质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 100083

咨询电话: (010) 82324508 (邮购部); (010) 82324580 (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gph.com.cn>

电子邮箱: zbs@gph.com.cn

传 真: (010) 82310759

印 刷: 北京地大彩印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frac{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116-05801-9

(如对本书有建议或意见, 敬请致电本社; 如本书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农村这片最广阔的天地孕育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农民这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中国是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8亿农村人口，农民的素质及其生活状况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如果不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那将是片面的、肤浅的，因为，在中国，没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仅仅只有城市的现代化而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平衡的；仅仅只有城镇居民的现代化而没有中国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全面的。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没有农业的现代

化，就不可能有整体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体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体中国人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难点正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只有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是“三农”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农民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发展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现代化的主体。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

我国“三农”问题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的束缚问题，我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农民问题。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产业，农民是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农村是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的社区，因此，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

农民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50年就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毛泽东文集》第六卷，1999）。

II

50 多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历了多个阶段，有顺畅也有曲折，但有一条经验是很鲜明的，那就是凡是党和国家的政策符合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这个阶段的社会事业就顺利、就发展（如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等）；凡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不符合实际，乃至有损于农民群众的利益，这个阶段的工作就困难，经济建设等事业的发展就停滞、缓慢，社会问题就增多。邓小平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科学总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农业基础地位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三农”思想。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三农”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2004 年以来连续四年党中央国务院都以一号文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部署。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城乡关系和特有的城乡发展路径，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运用，对于深入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很有意义。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些学者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依据中国的特有国情，把农村问题划分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分别进行研究，也研究三者各自要解决的问题，初步提出了“三农”问题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认识中国实际、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经过 10 多年的宣传和实践，现在已成为中国政界、学界的共识。

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以来，我们特别重视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问题，以保证

有效供给。但当1984年取得改革以来的第一个特大丰收以后，农村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等问题，随后又出现了“打白条”、农民负担重、干群矛盾冲突增加、农村社会不安定和城乡差距扩大等问题。这诸多问题的出现，使一部分中外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意识到，中国农村工作不仅要解决农业问题，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农民问题，他们将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作了分析和研究，写出了一批比较有说服力的著述。如有“发展经济学之父”之称的张培刚老前辈，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农业国与工业化”的理论，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指明了路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农民现代化的理论与路径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但已有的研究，无论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单方面研究，还是将“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都显不够。尤其是对农民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研究的人员少，另一方面研究欠系统、深入，特别是农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制约及影响问题分析和研究不够。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把“三农”问题联系起来，只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单项研究，至多也只是把农村、农民或农村、农业问题联系起来研究。因此，加强对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条件下的农民现代化的理论和实现途径问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作 者

2008年5月

目

Contents

农民及其现代化

次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认识农民	1
第二节 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	7
第三节 农民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18
第二章 “三农”问题的由来与积淀	31
第一节 “三农”问题的历史演进	31
第二节 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	40
第三章 农民问题的现状	52
第一节 农民政治地位不平等	53
第二节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57
第三节 城乡要素流动的不平等	60
第四节 劳动就业机会不均等	62
第五节 受教育机会不平等	63
第六节 土地非农, 农民失地	64
第七节 农村社会保障严重缺乏	64
第八节 市场准入的失衡	65
第九节 人的发展机遇不均等	66
第十节 社会制度的不对等	66

第四章 农民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70
第一节 农民现代化及其内涵	70
第二节 农民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87
第三节 农民的现代化要求	91
第四节 中国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优势	93
第五节 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包袱	95
第五章 农民的主体地位	98
第一节 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创造主体	98
第二节 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主体	110
第三节 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主体与价值 主体的统一	119
第六章 农民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122
第一节 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123
第二节 推广和应用农业先进技术	126
第三节 生产组织体系的创新	130
第四节 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创新	131
第七章 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135
第一节 农村工业化	135
第二节 乡村城市化	158
第三节 建设新农村, 倡导新生活	166
第四节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175
第八章 农民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	186
第一节 村落文化(农民文化)的变迁	186
第二节 转变对待传统和变革的观念	194
第三节 转变知足常乐和故步自封的思想	195

第四节	转变怕冒风险和胆小守旧的处世态度	196
第五节	转变浪费时间、不讲效率的劳动方式	197
第六节	转变对待知识和开放的意识	197
第七节	增强主体意识	198
第九章	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	199
第一节	培育新型农民的战略意义	199
第二节	培育新型农民的主要措施	202
第三节	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205
第四节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210
第五节	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216
结束语		229
后记		232
参考文献		23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认识农民

一、农民的界定

农民的定义是一个令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头痛的问题，中国的农民情况就更加复杂。什么是农民？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里特·罗吉斯认为：“农民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和传统定向的乡下人，他们一般比较谦卑，大多是自给自足的（虽然并非完全需要），就是说，他们生产的粮食及其他东西，大部分都是自己消费的。因此，农民和自给自足的生产者是一个意思。农民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型的，他们至少是部分市场定向的，他们要购买一些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需要社会的服务。但是，尽管他们要卖出部分的农业产品，他们也不是像商业农场主那样把农业作为一个企业。”（埃弗里特·罗吉斯等，1998）定义把不发达国家的农民与发达国家的农场主或农业经营者区别开来，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农民自身的变迁，从传统农民到农业经营者的过程。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认为：“农民是相对城市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无所谓农民。”（孟德拉斯，1979）

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我国的一些学者更多的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给农民下定义的，比如《辞海》中说，农民是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

社会，主要指贫农和中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指集体农民。”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对农民概念进行了比较深的研究，我们不妨择其要者恭录如下：“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 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 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ichan（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citizen）权利，亦即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公民（西语中公民、市民为同一词），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然而在许多不发达国家，农民一般不被称为 farmer，而被称为 peasant。而 peasant（汉语‘农民’的主要对应词）的定义则比 farmer 复杂。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而且一般来说，社会越是不发达，后面这些涵义就是越显得比‘农民’一词的职业涵义更重要，在这些社会里，不仅种田人是‘农民’，就是许多早已不种田的、住在城市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农民’的身份。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应当深有体会。事实上，如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农民科学家’、‘乡镇企业’和‘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改变了职业却改变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逻辑关系。”（秦晖，1996）

我们同意秦教授的分析。本书中所指的中国农民概念，不仅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实际上从事非农业生产但具有农民身份的人，即中国农民是指所有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

二、对农民认识的理论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和学术界对农民的不同认识

农民是个难以把握的群体，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中外学者都对他有各种不同的描述和认识。

早在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从阶级的角度对农民

的特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比如马克思针对当时法国的情况，认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95），由于同质性较强，因此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是一个阶级，但实际上由于缺乏联系，没有形成任何政治组织，因而并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指出，农民阶级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农民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他们的地位和利益各不相同，因而在政治态度上也极不一致。“第一是富裕农民”，“第二是小自由农”，“第三是封建佃农”，“最后是农业工人”。这四部分农民，在地位上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差别，富裕农民“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佣几个农业工人”，是剥削者，其他三个部分都是被剥削者。由于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政治态度的不同，富裕农民“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后面三个部分，他们和革命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农民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又具有私有性、分散性、保守性，眼光狭隘、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不可能独立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因此又有很强的革命性，愿意坚定地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共同取得革命的胜利。

列宁也主张将“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划分开来。”（《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劳动农民完全不愧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同志，是社会主义最大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社会主义工人在反对资本主义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而另一种农民，即“投机农民”，他们欺骗国家，在各地竭力进行趁火打劫等，列宁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但是在一段时间里，

列宁却又忽视了他曾强调的这种划分，常常把农民这个群体一概看作是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处于中间地位，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列宁还认为农民狭隘、保守、自私，较资产阶级更难改造。

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革命性，他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这个贫农大众，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他们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同时，他也认为，农民固有的落后性（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和农村生活的边缘性，又使得在农民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的领导，坚持对农民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时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认为，农民已不是革命的主体和依靠的力量了。不仅如此，由于农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是落后的，因此，在这种经济被改造的同时，农民也应该接受教育，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将农民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改造的对象。后来。毛泽东在坚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又试图重新肯定农民的革命主体性，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强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至少在舆论上是将贫下中农看作是教育者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并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来看待农民上述特性，来分析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李守经，2000）。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对传统农民做了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封闭、保守等方面的局限性。他说：“农民是‘高尚

的法国人’，但这些杰出的公民‘在国家中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地位’。难道他们不是代表着 1/3 的人口吗？难道不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养活了整个国家吗？但很遗憾的是，国家并不感激他们；他们的收入是其他生产者收入的一半，而‘他们与其他人一样聪明’。因此，肯定是由于制度上有毛病或农业政策失当。”当谈到农民思想保守、遵循传统一面时他说：“一个人出生在有着正统思想的家庭，其思想也变得正统，因为别人期望他能够做到那样。而且，如果他想逃避为他规定的角色，那他的一切企图都会遇到全体村民的强烈反对。”“一个农民尝试一种新事物，这会引起公愤：难道他自以为比他的父辈更灵巧、比他周围的人更聪明、比贵人们更有知识？否则他怎么敢做显贵们没有想到要做的事呢？他的行动可以说是对他人的一种侮辱，其他人必然会报以嘲笑和敌意，并运用各种社会约束的武器来令其遵守互识社会的传统规范。所有的人都预言他将遭到失败，为的是使他这个冒险的人能够摆脱病态的幻想，使一切都能够按照秩序进行，使大家都对传统的无可争议的价值感到放心，因为这价值比一切进步都更为重要。”（孟德拉斯，1991）

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里特·罗吉斯在《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农民亚文化的概念，对传统农民的特点做了如下概括：农民亚文化的中心内容有下列几项：① 人际关系中的互不信任；② 认为财富是有限的；③ 对政府的权威又依赖又敌视；④ 家庭主义；⑤ 缺乏革新精神；⑥ 宿命论；⑦ 有限的志向；⑧ 不能延迟满足；⑨ 地方局限的世界观；⑩ 移情能力低。

（二）我国对农民认识上的经验和教训

我国对农民的认识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深刻的教训。因此，正确认识中国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首要问题。

列宁曾讲过，农民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是劳动者，但同时又是私有者。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对农民的这种双重性格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的农民进行了历史的、深刻的阶级

分析，终于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国农民的特殊问题。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国，既有关于对待农民问题丰富的经验，也有极其痛心的教训，那么这些痛心的教训是什么呢？总的说来，就是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极“左”路线和措施。这个问题的最早起因是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后，对分得土地的农民的基本看法在党的理论方面和领导层有不同意见，其内涵包括农民究竟是土地的所有者，还是仅仅是土地的使用者？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提高了，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以及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民究竟只有一种积极性还是具有两种积极性？回答这些问题的极“左”看法是农民只能有土地的使用权，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和农民只有私有者的一种积极性，并把土地改革后农民发展生产、经济提高的一种正面效应，视为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这就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党的领导下作为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农民视为被改造、被动摇、被削弱、被否定的对象。

农民是私有者，小生产者，其理论根据主要是从列宁的论述中得来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是列宁在1920年5月总结俄国革命经验，并为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时说的话。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在时间上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小生产面临着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大部分要走向破产，而小部分产生资本主义的情况。列宁的原意并不是说农民小生产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会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而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对待农民的“左”倾错误上忽略了列宁所说的农民小生产的两重性，根本否定了农民小生产者首先是劳动者。农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一支主力军，事实上我们在改革前建立的国家工业体系，其主要资金的积

累是从农民那里得来的，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在第四章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与城市关系中有详细的论述。因此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基础，这与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国家发展的事实是不符的。因此，到了1980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邓小平曾对参加文件起草的人员讲，我们“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生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这显然是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一次从理论到实践上的重大拨乱反正，从而使我们更明确地理解到，我国在剥削和消灭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实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如果不加以纠正，不仅难有今天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而且更难有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

对农民认识的这个曲折过程，终于写到了党的正式文件中：“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生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的政策……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韩明谟，2001）

第二节 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

中国的社会变迁，很大程度上也是人数最多的农民的变迁。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农民的受压迫受剥削，国家贫穷，人民遭殃，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组织互助组，初级社农民喜气洋洋，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再到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就沉默、消极，最后的结果是8亿人种地没有饭吃。改革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以自